

中国西南地区 灾荒与社会变迁

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周 琼 高建国 主编

本文集由“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编辑而成，集中了国际、国内灾害史研究的前沿性成果，共收录27篇学术论文。其中，10篇“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的专题论文、9篇“环境疾病史与环境灾害史”的专题论文、8篇“灾荒与赈济”的专题论文，分别就历史时期西南、西北、华北、华南等地灾荒的原因、社会影响、赈灾措施、赈济制度、灾荒文献史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既对历史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也触及现实社会的灾害及其相关问题，同时还包括日本灾害史研究的新动向及相关研究成果。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A432-072
20112

本文集由2010年云南省教育厅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资助出版

本文集由云南大学专门史国家重点学科资助出版

中国西南地区 灾荒与社会变迁

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周 琮 高建国 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第七届中国灾害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周琼，高建国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5482-0306-3

I. ①中… II. ①周… ②高… III. ①自然灾害—历史—西南地区—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②社会变迁—西南地区—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X432-092②K2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6766号



责任编辑：熊晓霞

和六花

李平

封面设计：刘雨



中国西南地区 灾荒与社会变迁

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周琼 高建国 主编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428千

版 次：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0306-3

定 价：45.00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发言稿（代序）

李文海

各位学者，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春城昆明，相聚在具有悠久历史和学科特色的著名学府云南大学，共同来研讨“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这样一个主题，对于灾害史这个学科领域来说，称得上是一次学术盛会。我由衷地感谢会议主办单位的盛情邀请和热情接待，同时也衷心预祝本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会议圆满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随着政治大环境和学术大环境的不断优化，人文社会科学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回顾 30 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灾荒史研究，同其他学科相比，是在一个起点不同的条件下取得了同样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加迅速的发展。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值得自豪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和学术界对灾荒史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高，关注和支持的程度越来越大；发掘、整理了一大批内容丰富的珍贵历史资料，完成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使灾荒史学科的理论框架逐步清晰，学术内容日益充实，资料依据更加充分，在学科建设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学风严谨的专业队伍；同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日趋活跃。正因为这些，中国灾荒史研究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使他们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

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种种主客观原因的。如果简单地讲，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一是强烈的社会需求，二是观念的深刻转变，三是学科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

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术，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且这种需求越来越深刻地为社会所认识和了解时，才可能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有力的杠杆。我们谁也不会忘记近年来发生的那些突发性灾害。国内从 1998 年夏天的全国性洪涝巨灾，到 2003 年春夏的“非典”流行，再到 2008 年 5 月引起全民族巨大悲痛的汶川大地震，再到今年春季的玉树地震，一直到现在正在经历着的由于极端天气条件造成

的多发性洪涝灾害（按照回良玉同志的说法，这次灾害“受灾范围之广、洪水量级之大、出现险情之多、灾害损失之重，均为历史罕见”），特别是刚刚发生的“灾害损失比例重过汶川”的甘肃舟曲县突发性特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国外从2004年岁末印度洋地震引发的大海啸，到导致21万余人罹难的海地大地震，到全球范围的甲型流感大流行，一直到现在仍在肆虐的葡萄牙、俄罗斯的森林大火及大面积旱灾，巴基斯坦的严重洪灾。所有这些，是如此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自然灾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威胁和障碍。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社会面貌瞬息万变。这种情况，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对于社会和自然灾害的关系来说，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的能力，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有效地防灾、抗灾、救灾的能力。但另一方面，由于人类不恰当地对待自然界，迅速发展的科技和经济反而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日益增加，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几年以前，联合国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在最近30年时间里，城市快速扩张，大片的森林遭到破坏，内陆的湖泊干涸，触目惊心地展示了人类对地球的破坏性影响。

正因为这样，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加强防灾减灾，就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灾害史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凸显出其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我国的国内情况来说，进入21世纪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问题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其中，“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正是灾害史应该着重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然，灾害史学科能够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重视，同我们广大灾害史研究工作者的潜心钻研、刻苦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大家的辛勤劳动，使得社会真正感到这门学问能够为现实生活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这才使灾害史学科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俗话说，“有为才能有位”。某个学科的学术价值，只有靠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贡献来证明、来取得。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正因为大家做出了成绩，最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学的课题指南每年几乎都有关于灾害史的项目。这当然一方面表明国家和社会对灾害史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对灾害史研究工作的肯定。

同志们，我们都是灾荒史研究的同行。过去有句老话，叫做“同行是冤家”，还有一句话叫做“文人相轻”。这两句话当然并不是普遍规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实际。但是，只要我们大家都有着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只要我们大家都努力弘扬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历史真实的优良学风，只要我们大家都有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又善于尊重和容纳学术多样性的学者风度，只要我们能够多搭建一些像这次会议一样进行学术交流、信息互通、成果共享的学术平台，上面那两句话就可以各改一个字：“同行是冤家”变成“同行是一家”，“文人相轻”变成“文人相亲”。只要我们的队伍是团结的，同心同德的，朝气蓬勃的，我们就一定会在新的世纪里为灾害史的研究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谢谢大家！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科评审组组长、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前主任、中国近代灾荒史奠基人。

目 录

综 述

灾害及其防御、应对

- “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周 琼 (3)

第一篇 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

- 具有抗震性能的云南省农村穿斗式木结构房屋 高建国 (13)
- 云南大旱的人文思考 林超民 (20)
- 清至民国时期云南的地震灾害与地方社会 曾桂林 (32)
- 同乡组织与 1925 年云南大理地震救灾初探
 ——以北京云南震灾协济会为中心的考察 苗艳丽 (47)
- 清代以来云南小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变迁与泥石流的历史成因分析
 王志芬 (58)
- 士绅与清代云南仓储 路中康 (67)
- 清前期贵州灾荒浅析 (1644—1735) 彭 法 (73)
- 烤烟与生态
 ——以云南大姚县石羊镇为例 付 春 (84)
- 金沙江 (滇西段) 淘金与社会环境变迁 和六花 (90)
- 1925 年云南霜灾的社会影响初探 濮玉慧 (103)

第二篇 环境疾病史与环境灾害史

- 中医文献中的鼠疫史料提要 符友丰 (117)
- 1949—1965 年湖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流行原因 杨鹏程 明勇军 (124)
- 从麻风病的传播看汉唐时期中印佛教应对措施的差别 高 凯 (134)

日本的灾害史、疾病史研究动向	〔日〕福士由纪等 (148)
1946 年湖南疫灾简论	朱松华 (165)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疫灾及成因研究	汪子龙 (173)
近年东亚中低纬多灾及变化趋势	王涌泉 (182)
论生态灾难的历史演变趋势	黎德化 (189)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与经济变迁	佳宏伟 (197)

第三篇 灾荒与赈济

17 世纪中国灾害史考证	侯 琴 (213)
明代陕西旱灾历史资料的整理	王社教 (228)
1942 年河南大旱及其政府应对述略	苏新留 (251)
清代审户程序研究	周 琼 (261)
清代新疆旱灾初步研究	阿利娅·艾尼瓦尔 (274)
从档案中地方官员奏折看清代安徽农业灾害与政府应对	李 飞 (287)
1695 年临汾地震恢复重建过程初探	董海鹏 (297)
地震与西汉灾异思想	叶少飞 陆小燕 (305)

附 录

附录一：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贺信	(315)
附录二：“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未刊登论文摘要	(316)
后 记	(328)

综 述

灾害及其防御、应对

——“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周 琼

自然灾害及其防御、应对，是人类面临的永恒的难题。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史。每当灾害突然袭来，人类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避灾、防灾、抗灾的意识、措施、制度也随之诞生并日趋完善。随着人类改造自然力量的增强，环境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因环境破坏引发的环境灾害的频次也不断增多，后果也日益严重。在人类与自然灾害及环境灾害、灾难作斗争的过程中，防灾、抗灾技术不断进步，救灾制度逐渐建立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对灾害的防治起到了资鉴作用。

2010年，西南大旱、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云南贡山特大泥石流等各种灾害相继发生，进一步探讨灾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生态环境及民族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就成为灾害史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继续总结防灾、抗灾、减灾的经验教训，强化防灾意识及措施、制度的建设，深入探求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平稳发展的内在机制，依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为从多学科的视角研究西南灾荒与民族区域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发掘西南各民族应对灾荒的措施及经验，促进西南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减灾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的“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8月20~23日在云南大学科学馆隆重召开。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的53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蒞会，提交论文50余篇。在为期两天的专题讨论中，围绕“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研究的主题，分“环境灾害史”、“灾荒史文献研究”、“环境疾病史”、“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灾荒与赈济”等专题展开了多视角、跨学科的高水平学术讨论，着重探讨了灾害史、环境疾病史、赈灾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其实证途径。

此次研讨会所具有的学术及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李文海先生指出，会议存在五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围绕会议主题提交的论文，从题材、内容到问题的覆盖面，再到研究的视角，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二，大部分论文经过了扎实的

研究、深入的思考,有观点、有内容,也有资料根据,学风较好,年轻学者数量明显增加,并能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三,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紧密结合,历史的氛围与强烈的现实感紧密结合。其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会议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友好的对话、讨论,两类学者在思维方式、观察问题的角度等问题上都有差异,并产生碰撞、交流,学者们深受启发。其五,会风良好。会议做到了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在评论时讲实话、讲真话,没有空话套话,对一些敏感问题,学者也能以强烈的责任感,态度鲜明地发表意见;学者间的不同观点和看法也能直率地交流,真正做到了批评与反批评;学生辈与老师辈的学者们相互进行坦诚、大胆的讨论。

一、现实关怀——灾害史研究的意义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沟通以及历史对现实的资鉴作用,是灾害史研究的动力及活力之所在。因此,对灾害的现实关怀意识贯穿了会议的始终,灾害史学者的责任感、使命感格外引人注目。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科评审组组长、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前主任、中国近代灾荒史奠基人李文海先生指出,这次会议“在灾害史学科领域称得上是一次学术的盛会”,他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灾害史学科的发展状况,认为社会需求是推动灾害史学科发展的最强推动力,人们观念上的转变对学科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文海先生呼吁大家同心同德,在新世纪里为灾害史的研究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这是对本次灾害史年会所作的有较高学术水准及现实意义的讲话,基于此,文集编委会研究决定,将李文海先生的发言作为论文集的序言,让读者在翻开文集的时候,就能够读到这篇寓深刻思想性和学术性于一体的精彩文章。

从地球科学的视角研究灾害的原因、区域性特点及其防治,是灾害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方向。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顾问王涌泉先生在《近年东亚低纬多灾》^①的发言中,指出了一个需引起灾害史研究学界关注的问题,即“1998年以来,全球严重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区集中在东亚低纬度地带,这是一个重大地球科学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先生鉴于近年来云南旱涝灾害频发的状况,在《云南大旱的人文思考》的发言中指出,在灾害背后,“亦存在生态破坏、水利

^① 各位学者的参会论文在会后均作了修改完善,论文的题目、内容、篇幅都有所调整。本综述提及的文章名以参会论文为准。

失修、水质污染、官员贪腐、社会失控、精神失落等人文因素。我们的旱灾是因为缺水，更是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失。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精神、有良心的历史工作者应当面向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探索走向未来的正确途径”。

灾害史研究的国际合作及交流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日本灾害史的研究方法及动向是会议亮点之一。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门司和彦先生的主题报告《环境疾病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以他的研究项目为引子，强调了多学科交叉在环境疾病研究中的重要性。日本青山学院大学部饭岛涉先生的《灾害与历史：一个初步性的思考》就提出了在灾害史研究中应重视国内外文献的综合运用，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对话是环境史、灾害史和历史研究的未来方向，提出了灾害纪念即建立灾害博物馆的设想。福士由纪博士的《日本的灾害史、疾病史研究动向》介绍了日本灾害史研究动向及日本的中国灾害史研究动向，认为近十年来日本的中国灾害史研究动态有三个新特色，一是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来研究，二是疾病史方面的研究增加，三是综合性研究增加，即日本跨学科、跨国家的研究项目越来越多。

二、对西南灾荒的首次集中研讨

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历史上，各种自然灾害便频频发生，但学界对此关注不多，成果也较少。本次会议集中研讨了西南地震、泥石流、霜冻等灾害及其影响、赈灾问题，这是在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问题上进行的首次集中探讨，在理论及方法上对西南灾害史研究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西南位于欧亚地震带中的地中海—喜马拉雅山地震带上，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历史上的地震灾害频频见于文献记载。对云南地震灾害及其救灾模式的探讨，是本次会议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兼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高建国研究员的《具有抗震性能的云南省农村穿斗式木结构房屋》认为，云南村镇尤其是在贫困山区，多采用穿斗式木构架房屋，是白族、彝族、纳西族等族民居通常采用的结构形式，地震作用下，榫卯连接处摩擦滑移耗能，形成良好的隔震消能结构体系。湖南师范大学曾桂林的《清至民国时期云南的地震灾害与社会应对（1659—1949）》认为，清代迄至民国的近三百年间，云南的破坏性地震主要集中于乾隆年间和民国时期，地理空间分布则主要集中在滇西、滇南一带，迤西的大理、丽江及其属县地震最为频发，且为灾甚巨。对此，政府和民间社会形成了一套应对机制。

1925年在云南大理等地发生了强烈的大地震，造成极为严重的社会影响，

诱发了火灾、水灾、霜灾、瘟疫等灾害，但对这次灾害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不多。昆明理工大学苗艳丽的《民国云南地震灾害与政府救灾评述》运用地震社会学等相关理论，认为民国年间地震活动频繁，但云南抵御灾害的能力较弱，政府在预防和灾后重建中的作用极为有限。云南大学历史系濮玉慧《1925年滇东霜灾的社会影响初探》探讨了民国年间的滇东霜灾引发的系列危机，认为1925年滇东霜灾造成了惨重后果，与政局动荡、鸦片流毒、仓储不足、匪患迭起等人祸有关。

明清以来云南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采，不仅对云南的社会经济及历史发展进程造成了极大影响，成为引发战争的原因，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矿产资源开采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成为会议研讨的重要内容。复旦大学杨煜达的《灾荒、战乱与清代云南铜业》认为1855年后云南铜业的停顿是太平天国战争和云南回民起义的结果，灾害对矿业的影响主要通过粮食供应来实现，云南铜业生产受到政府干预极为强烈，区域性灾害的影响往往能被政府和产业本身所转移，而更大空间范围的战争却会对其造成更大的打击。云南大学和六花的《金沙江与浊流：金沙江（滇西段）淘金与社会环境变迁》结合史料和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论述了金沙江淘金的历史及其淘金概况，探讨淘金与区域环境变迁的关系。云南大学王志芬《清代以来云南小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变迁与泥石流的历史成因分析》认为清代改土归流、移民垦殖及矿业开发、军屯、商贸活动及其导致的生态变迁，是小江流域泥石流频发的重要原因，泥石流灾害促使生态环境恶化，加剧了泥石流灾害的频次和后果。

西南灾荒及其应对机制的研究，是西南灾害史研究中极为薄弱的领域，本次会议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西北大学路中康的《士绅与清代云南仓储》认为士绅在清代云南仓储的修建和劝办积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期是捐输积储、参与管理，逐步掌握义仓、社仓的控制权，士绅对仓储的控制与清代云南仓储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彭法的《清前期贵州灾荒浅析（1644—1735年）》论述了清前期贵州灾荒频仍，以水灾、旱灾为最，灾荒与战乱交织出现，地方政府采取了抚辑流民、蠲免钱粮、设仓备荒的赈灾措施。

西南地区不仅历史上灾荒频发，现实中的灾害也让人记忆深刻，尤其是2009—2010年的特大旱灾，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对现实灾害的关注及其原因、对策的探讨，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北京林业大学李莉的《森林资源利用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贵州省为例的探讨》论述了贵州省森林的地理分布受环境及经济的客观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森林资源的破坏，森林破坏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云南省委党校付春的《烤烟与生态——以云南大姚县石羊镇为例》探讨了云南彝族山区与半山区以柴为烘烤原料的烤烟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冲击及影响，认为应

放弃目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科学发展,适时调整农林产业结构,做到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找出一条解决林烟种植矛盾的确实可行之路,对烤烟生产进行生态补偿与资源补偿。

三、对环境灾害及疾病史的研讨

因环境恶化而引发的各种灾害被称为环境灾害,环境灾害引发了各种严重的后果,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学界在环境灾害史方面的探索中也不断有新的、可喜的成果涌现出来。华南农业大学黎德化的《论生态灾害的历史演变趋势》从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研究角度出发,揭示了生态灾难的历史演变趋势,着重分析了生态灾难与自然灾害的关系。

环境疾病史领域的深入探讨是本届会议另一个极为突出的、引人关注的核心内容,对鼠疫尤其是云南鼠疫的集中关注及深入探讨,成为最受关注的亮点。首都中医药大学符友丰先生的《略论中医文献中的鼠疫史料——关于鼠疫史与中医史、医疗史相关性与复杂性话题》通过人类疾患之首的疫病史料的回顾,探讨了鼠疫史料在中医文献中存在、显现的基本特征与规律,分析了从远古到1890年《鼠疫汇编》的出版和鼠疫杆菌发现期间鼠疫史料在中医文献中的特征与研究思路。

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先生的《战后之疫:1943—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以环境史为视角》讨论了滇西抗战后鼠疫大肆流行的情况,认为1943年5至6月间南甸地区开始的鼠间鼠疫流行,与同年6至7月间及以后的人间鼠疫流行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1946年滇西人间鼠疫的流行是由当地鼠间鼠疫的流行所致。上海交通大学李玉尚的《美洲作物与清代云南的鼠间鼠疫》认为农作物是各种鼠类之间特别是家鼠、野鼠接触的基本媒介,美洲作物引进和推广改变了云南原先的农业结构,与乾隆后期家鼠集中大死亡和人间鼠疫大流行相伴随。云南(大理)流行病防治所田杰先生的《云南鼠疫史简介》梳理了云南鼠疫流行的历史,介绍了云南近代几次重大鼠疫流行的事件。

对血吸虫病、疫灾、麻风病、蛊等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地域性疾病关注的兴趣。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斌的《早期中华文化中的蛊》通过分析甲骨文和早期文献中的有关材料,考证蛊的本源和其在汉代之前的发展引申,认为蛊的本意是病害或者病祟,到了春秋时代,蛊的引申义已臻完备,病祟渐离。湖南科技大学杨鹏程先生《1949—1965年湖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流行原因》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的自然原因及其社会原因。湖南科技大学朱松华《简论1946年湖南疫灾》认为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城乡环境卫生的恶劣及1945—1946年连续特大旱灾,引发了全省特大饥荒,造成1946年湖南疫灾肆虐。湖南科技大学汪

子龙《试论民国后期（1928—1949）湖南疫灾及成因》认为民国年间湖南疫病的流行与泛滥，与地理环境、自然灾害和战乱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郑州大学高凯《从麻风病的传播看汉唐时期中印佛教间的几个差别》一文是近年来在麻风病研究中的新视角，从麻风病与佛教一些具体关联的现象进行论证，认为随着佛教传入、胡僧及商人足迹的扩张，麻风病在古代中国开始肆虐，今天中国麻风病的多发区和中等发病区是历史上佛教高度发展的地区。

四、对灾赈制度研究的深化及推动

历史时期的灾荒与赈济一直是灾荒史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本次会议对区域灾荒史及灾赈制度在理论、方法方面进行了深入、持续研讨，对深化灾荒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委会侯琴的《17世纪中国灾害史考证》认为，中国17世纪干旱、地震、洪水灾害频繁发生，旱、震、洪灾害间有密切关系，其间存在着链式结构，并讨论了灾害链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的《清代救荒体制的演变》认为整个清代体制的演变是从恢复到完善，再到衰变，最后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从乾隆朝开始，官、绅在救灾中的合作得到充分体现。教育部吴四伍的《官绅合作与晚清仓储管理》认为清代在积谷仓储的管理中，绅士地位提高，官绅关系出现新变化，官绅合作成为主导管理模式，但绅士并未完全获得仓储管理权，从苏州丰备义仓的修订费用到佛山义仓的管理就是如此，晚清仓储的管理权力结构变化，与其说是权力下移，还不如说责任下移。

云南大学周琼的《乾隆朝勘灾执行措施初探》在梳理及分析清代荒政书、清实录、清会典等史料的基础上，首次对乾隆朝勘灾的执行程序及措施，即确定勘灾人员、划定勘灾区域、查造草册、填写门单、勘定灾情分数、审户、发放赈票、上报勘灾表册等进行了分析及论述。叶少飞、陆小燕的《地震与西汉灾异思想》认为西汉宣帝即位之后，正式将灾异思想用于国家生活并指导政治实践，地震在这个转变及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区域灾荒的研究中，西北、华北灾荒史的研究成果较多。新疆师范大学阿利娅·艾尼瓦尔的《清代新疆旱灾初步研究》认为清代新疆旱灾有一定的规律性，在时间上有连续性、空间上有地域集中性，干旱持久、地域性强是新疆旱灾的特点。山西大学董海鹏的《1695年临汾地震的恢复重建过程初探》对1695年临汾地区发生的8级地震进行论述，对临汾、襄陵、洪洞和浮山等重灾区的重建状况进行比较，初步探析临汾地震后灾区的恢复发展过程，并讨论地震对区域社会的影响。安阳师范学院苏新留教授《试论1942年河南大旱荒及其政府应对》

认为在 1942 年河南罕见的大旱中, 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救灾措施, 表明了一个转型中的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自己在赈灾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

对灾害史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及史料范围的延伸和拓展, 一直是灾荒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而受到高度重视。本次会议拓展了灾荒史文献的范围, 陕西师范大学王社教的《明代陕西旱灾历史资料的整理》就以《明实录》的记载为基本资料, 参稽其他史料, 梳理了明代陕西旱灾的时间、范围、过程、灾害影响和应对措施等信息。云南大学陆韧、朱振刚的《从〈明实录〉看明代云南民族地区灾害的特点及赈灾方式》认为, 《明实录》及天启《滇志》记载的灾害在时间、区域、类型上都不完整, 明代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避灾防灾功能, 但不足以完全抵御自然灾害。北京林业大学李飞《从档案中地方官员奏折看清代安徽农业灾害与政府应对》以档案为切入点, 以安徽地方官员奏折为考察对象, 分析其中所记录的农业灾害的形式特点、成因及影响, 探讨清政府的预防、救治措施。

灾荒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 面对日趋频繁的危害, 总结历史经验以资鉴当代成为灾荒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使灾荒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成为与会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改革、完善现有的救灾、防灾机制, 救灾资金来源多样化成为当务之急, 对中国当前防灾、抗灾、救灾、环境保护等热点和难点问题所作的思考和建议, 对未来灾荒史研究趋势的引领、对现实灾赈制度的建设有积极意义。

李文海先生对今后灾荒史如何加深研究、灾荒史学科如何走上繁荣之路提出的独到建议, 对今后灾荒史的研究及研究取向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他认为在灾荒史的研究中要做到六个方面的并重与结合: 一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参与并重。作为一个灾害历史漫长的国家, 中国历史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 但又不能就历史谈历史, 强调现实参与, 更多地发表一些针对现实的参与性的意见, 而不只是对历史的描述。二是理论思考与实践研究并重。改革开放后, 系统化研究的趋势让人担忧, 宏观的研究和理论的思考比较薄弱。灾害史学科的理论框架、对象、任务、特点等都是需要一个需要下工夫的工作, 从具体研究中得出概括性、理论性的观点。三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当代科学发展的特点就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 很多创新来源于不同学科间的结合, 尤其是双重性质的灾害史就有更强的紧迫性。四是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并重。历史学与其他大多数学科最根本最大的不同, 就是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现实存在的, 而只有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已经逝去了的, 历史资料对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是大项目与小项目并重。改变独自研究写著作的方式, 联合起来, 集中精力做一些大项目。六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灾害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